

文化茶座

辛丑牛年漫说“牛”

■赵成生

甲子轮回,辛丑又至。

辛丑俗称“牛年”。千百年来,牛兆农耕兴盛,稼穡适时,五谷丰登。如今,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延续数千年的农耕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根本变化,中国农民所期盼的“耕地不用牛”的夙愿,早已成为现实。

牛不耕田,大众便少见其“踪影”。从小生活在网络时代的少年、稚子,大多是通过荧屏或互联网识牛。与牛相关记忆的群体淡忘对经历过牛主农耕时代的上一辈人来说,少了一份浓浓的乡愁,多了一份不舍的记忆。



古往今来,牛与土地是中国老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景,简单而实在:“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一头牛便是半份家当,许多农家视牛为宝,钟爱之情难以割舍。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遭遇了连续三年的特大困难,生活极为艰苦。那时,我们生产队的一头老黄牛死了,各家都分到了一块牛肉。这对于常年挨饿的乡亲来说,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美味佳肴。可队里饲养这头牛多年的张大爷,却硬是不愿吃那块牛肉。他老泪纵横地说:“老伙计,我给你的草料里都多加了麦麸,你咋不吃就走了呀!”没过多久,张大爷也离开了人世。村民唏嘘之余,找来那块已变质风干的牛肉,摆放在老人的灵前……

古仁心仁,一脉相承。

“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也许宋代李纲的这首《病牛》诗,能为张大爷感恩于牛、爱牛如命的情怀,作出最好的诠释。



合和之美,美美与共。在漫长的农耕文明时期,人与牛相依相从,结伴而行,创造了史诗般的农耕文化,推动社会不断进步与发展。

众所周知,牛浑身都是宝。

牛角可做墨斗,供木匠绳墨画线,还可制成号角,号令三军冲锋陷阵;牛皮可蒙鼓面,除了演奏鼓乐,鼙鼓更是古代军队闻之起舞的天籁,素有“听鼙鼓而思大将”之谓;用熟牛皮绳结成的竹筒,被称为“韦编”,对传承中华文化居功至伟,“韦编三绝”,道出了文人志士皓首穷经的万般辛苦;虽牛溲(尿)马勃声名不雅,而牛黄狗宝却是难得的珍贵之物,中医常用其祛除沉疴,益寿延年。

正因为牛对人不可或缺,所以凡有人居的地方,必有牛的出现,发生牛的故事。

战国时,秦国有个名叫牛缺的人前往邯郸,途中遇盗。其时天气严寒,风沙甚猛,他脱下外套,盖在拉车的牛身上。强盗见牛缺不顾身危,从容呵护黄牛,颇为不解,问其缘由。牛缺对曰:“君子不以所养害其养。”(见《淮南子·人间》)

人对牛关爱备至呵护有加,而牛亦会“投桃报李”,助人成才。《新唐书·李密传》记:“闻包恺在缙山,往从之。以蒲鞞乘牛,挂《汉书》一帙角上,行且读。越国公杨素适见于道,按辔蹊其后,曰:‘何书生勤如此?’密识素,下拜。问所读,曰:‘项羽传。’因与语,奇之。”

苍天不负有心人。这个李密牛角挂书苦读成才,后来成了反隋晋益瓦岗寨的寨主。



牛不仅生前任劳任怨,助人为乐,连死后埋葬之地,也会灵光闪耀,降福于人。

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遗产,踩高跷正在离我们渐行渐远。

我学过踩高跷,那是几十年前的事。每年春节,在北方农村都要举办文化演出活动,作为一项观赏性很强的活动,踩高跷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节目。因此,腊月,在乡村的大街小巷,可以看到一些孩子踩着高跷为文艺活动展演预热。

在举办的文化活动中,高跷扮演者不但身着戏装,浓妆艳抹,且歌且舞,而且往往装扮成折子戏的角色。踩高跷的角色,因为各自身份不同,所以造型各异,高低不一。我们作为学龄儿童,踩的高跷较低,但学习起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我十多岁那年,一位老师见到我问:“你学踩高跷吗?”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学,什么时候开始!”就这样我投入到学习踩高跷中。看到别人踩高跷轻松愉快,潇洒自如,但真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我把木质的拐子拿来,坐在不高的土墙上,绑扎在小腿上,刚一迈步,就是一个驴打滚,从高处倒下来。由于年纪小,高跷又不高,我赶忙爬起来,忘了自己脚绑着高跷,谁知又是一个倒地。那时真是洋相百出,一会儿是一个“倒栽葱”,一会儿又差点摔个四脚朝天,就像小孩刚学步一样。

那位老师对我说:“学高跷光有热情不行,还得有巧劲,首先要掌握平衡。双手甩开,眼睛向前看,走起来要大,不要低头看鼻尖的东西。”按照老师的话,我照着去做,果然见效。又是一天时间,我便轻轻松松地学会了,踩高跷像在平地走路一样。

趁我学习踩高跷的热乎劲,老师又给我讲起高跷的来龙去脉和各地高跷的种类。

据历史资料考证,远在尧舜时代,以鹤为图腾的丹朱氏族在祭祀中要踩着高跷拟鹤跳舞(见孙作云《说丹朱》);考古学家认为,甲骨文已有近似踩跷起舞形象的字(见方起东《甲骨文中商代舞蹈》)。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高跷本属中国古代百戏中的一种,早在春秋时已出现。中国最早介绍高跷的文字见于《列子·说符》篇:“宋有兰子者,以技干宋元君。宋元君召而见其技。以双枝长倍其身,属

《晋书·周光传》讲述了“牛眠地”的来历:陶侃未发达前,他的老母去世,正准备安葬时,家里的一头牛突然不见了。寻牛途中,遇智叟指点,说牛已死在前方山下的泥淖中,若能把母亲埋葬在那里,后人必位极人臣。陶侃依其言,葬母于“牛眠地”。后来果然应验,他做了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诸军事,封长沙郡公。他的嫡曾孙陶渊明虽然只做过彭泽县令,却是名满天下的田园诗派开山鼻祖。

当然,世事无常,人各有别。也有人在用“第三只眼睛”,对牛评头品足。

汉人牟融在《理惑论》中说:“公明仪为牛弹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闻,不合其耳矣。”不入牛耳者,非琴乐不雅,乃牛鲁钝也。

牛只是鲁钝也还罢了,它的倔强脾气,更遭人诟病。司马光实行“元祐更化”,对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予以秋后算账,同为“旧党”的苏轼,劝司马光循序图进,温公不听,苏轼气得跺脚直呼:“司马牛,司马牛!”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自谦为“牛马走”,意谓像牛马一样,供人驱使行走。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称:“太史公牛马走。”而陆游却对此不以为然,作诗《杂兴》讥讽曰:“区区长牛马走,齷齪虻虱臣。”



在周王室式微、诸侯争霸、战乱频仍的春秋战国时期,牛为保家卫国也立下了莫大的功劳。牛犒退敌,是《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录的一件事。

公元前628年,郑文公驾崩,举国慌乱。此前驻军郑国的秦将杞子,暗中送信给秦穆公,说如果攻打郑国,机不可失,他已做好了里应外合的准备。秦穆公早有灭郑之心,遂派大将孟明视率军千里奔袭,去攻打郑国。

郑国商人弦高半路得知消息,深为家国安危担忧,急忙派人回国报警,又备好十二头肥牛,诈称是朝廷使臣,前去慰劳秦军。

孟明视本来是奉命前来偷袭的,及至见到弦高,以为郑国已做好了防备,只好悻悻地撤兵而去。郑国意外获救,避免了灭顶之灾。

以牛为馈、智退偷袭之师固然称奇,而派牛冲锋陷阵,以“火牛阵”击溃数倍于己的围城强敌,则更波澜壮阔,蔚为大观。

公元前284年,乐毅受命指挥燕、楚、秦、赵、魏五国联军,一举攻克齐国七十余城,只剩下莒和即墨。在风雨中飘摇,岌岌可危。

守卫即墨城的是齐将田单。他知道乐毅是位能征善战的名将,很难对付,便巧施离间之计,使燕惠王派骑劫取代了乐毅。

骑劫立功心切,连连发动强攻,即墨危在旦夕。情急之下,田单心生一计,他让军士把五千多头牛装扮成狰狞可怖的怪兽模样,并在牛角上捆绑了尖刀,牛尾系了油浸的麻团。

这天夜里,五千头牛犹如天降神兵,直冲敌营,联军士兵惊骇不已,四散逃亡,主帅骑劫也糊里糊涂死于乱刀之下。



范蠡是春秋时期的一位传奇大咖。他不仅从政有道,功勋卓著,而且经商有术,富甲天下。因他三迁至陶,人皆称他“陶朱公”。

鲁人猗顿,辗转流落到了河东猗氏,因不善经营,仍过着“耕则常饥,桑则常寒”的贫苦生活。他慕名去找陶朱公讨教,陶朱公只说了八个字:“子欲致富,当畜五牴”。猗顿顿茅塞顿开,“大蓄牛羊于猗氏之南”,成为河东首富。

其实,河东还有一位特别会养牛的人,他就是

虞国的百里奚。

百里奚年轻时家境贫寒,靠为人放牛谋生。后来,在好友宫奇的引荐下,他当了虞国的大夫。公元前658年,晋国假道灭虢,唇亡齿寒,虞国也被回师的晋军灭掉了。百里奚成了俘虏,被晋献公当作女儿的媵人,陪嫁去秦国。行至途中,他趁机逃跑到宛(今河南南阳),却被楚人抓去养牛。

百里奚是养牛的好把式。他养的牛膘肥体壮,繁殖快,而且牛群听指挥,好管理,主家很快就发了大财。有人问他养牛的秘密,他说:“没别的,人牛一心而已。”

秦穆公用五张公羊皮赎回了百里奚,因此人称其“五羖大夫”。他做了秦相后,礼教天下,施恩于民,辅佐穆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他的儿子孟明视军功赫赫,是秦国有名的战将。百里奚因牛得福,父子同朝,一文一武,各显其荣。



有人以牛为例,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异,说中国人养牛、用牛,是懂牛、爱牛,充满与牛共生的人性化文明;而西方的一些国家,尤其是西班牙人,最初只把牛当作供神的祭品,后又演变为尚勇精神的陪衬,而随意凌辱、杀戮。他们的“斗牛”表演,便是赤裸裸的虐牛、戕牛之残忍之举。

西班牙“斗牛”传世久远,曾经是万众瞩目的王牌节目,也由此形成了一门产业,出现了一批专业斗牛士。数百年来,人们对这种充满血腥杀戮的表演,感觉麻木,习以为常,只追求感官刺激,而失去了对受害之牛的同情、怜悯之心。直到近些年的某一天,动物保护组织的爱心人士,对此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与批评,人们这才猛然醒悟:人与牛同属地球村成员,应和谐相处,共享文明,人绝不可只为了显示强大,娱乐眼球,而去虐待牛。

十多年前,西班牙斗牛表演戛然而止,这是世界文明的一大进步。真该感谢那些爱心人士当年的那声警世棒喝!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宋代苏轼《定风波》词中的名句,读来令人荡气回肠,油然而生敬意。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他一生跌宕起伏,历尽艰难,却始终坚守初心,不坠凌云之志。“一蓑烟雨任平生”,显示了他独立寒秋、不惧风雨的坚强秉性与豁达胸怀。

蓑衣,就是用麻或草编织成的雨具,如果用来为牛御寒、遮雨,则名“牛衣”。《汉书·王章传》记:“初,章为诸生学长安,独与妻居。章疾病,无被,卧牛衣中,与妻诀,涕泣。”这便是牛衣对泣的由来。王章漂流长安苦读,尚不知前途如何。极度艰难困苦之中,他绝不可能放飞心情,去唱信天游的,只能与妻相拥,牛衣对泣。当然,在我国色彩斑斓的牛文化里,除了牛衣对泣的不堪,更有执牛耳的权威与荣耀。原来,古代诸侯歃血盟誓,要把牛耳割下来放在玉盘里,由盟主捧其明誓,故称盟主为“执牛耳”。

如今,牛衣与“执牛耳”皆已远去,牛也随着时代的变迁与现代科技的发达,退出了原来的舞台,难觅昔日的风采。如欲领略我国独具特色的牛文化,不妨读读《诗经·小雅·无羊》,唐代李白的《咏石牛》、柳宗元的《牛赋》、刘禹锡的《叹牛》,宋代梅尧臣的《耕牛》,还可找来唐代大画家韩滉的名画《五牛图》,尽情观赏一番。如若还不过瘾,就去永济蒲津渡,看看“黄河大铁牛”。那可是“国宝”级文物,一定会让你神思飞扬,大开眼界!

头,上身扮演与之相应的人物,组成一组造型,在乐曲锣鼓声中边舞动边前进。

看到这些表演令人耳目一新,也对踩高跷增添了兴致。有一年,我有幸参加了当地文化活动。过去在乡间看文艺表演的观众,只有几百人,顶多千余人,到县城就是另一番天地,观众能翻个好几倍。因此,上台表演对我来说如同“上京赶考”,我暗地鼓励自己:只许成功,不能失败。

正月十一我们从农村来到县城,那阵势就让人心里打鼓:大街上人山人海,两边站满了看热闹的人,有的拿着板凳,有的全神贯注地站在那里。不到表演时间,我们只能在一个角落等着,轮到我们的表演,一众踩着高跷身着多彩服装,在腰鼓、铜锣、大小镲的打击乐中穿行而过。表演者是传统戏装打扮,由开路棍打头人,随之便出现肖恩、白蛇、唐僧、丑婆、姜子牙等艺术形象一步一晃地行进,由于诙谐有趣,颇引人注目。

当我们行至沿途的大商店门前时,只见门前摆着一张八仙桌,这时一位长者说:“大家注意了,王麻子做准备要跳桌子了。”王麻子是一位三十开外的汉子,只见他挽了挽长袖,打起精神,起双拐一个激灵便跳到桌上,接着又一个翻滚,又跳到地上,真是干净利落,赢得一片喝彩声。一番表演后,人们摆上茶水、点心,放鞭炮道辛苦,表示慰劳。我们是小孩,初学技术差,只能当下手。那些表演“过仙桥”“跳桌子”“跳双凳”“大劈叉”等叠拐、碰拐、背拐、跌叉、跳桌、翻跟头等技巧动作,没有十年八年的功夫积淀是不行的。不过,能参加一年一度的文艺表演,也算是幸运的。

时过境迁,几十年过去了,有时候做梦还梦见当年踩高跷的情景。当然,日新月异,随着时代进步、科技发展,人们的眼光高了,而高跷仍然保留着它的原汁原味,当年的木质框架没有变,技术含量没有少,只是人们的审美观、时代品位变了,因此高跷也渐渐离开了人们的视野。

大年初一过后,到亲戚家走动,在北方一些地方叫“出门”。“出门”走亲戚,带什么“礼”呢?现在年轻一点的人可能想象不到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前很多带的是“馍”。“馍”即食用的馒头。有人或许会惊讶:这还能算“礼”?不是每天都在吃嘛!

在农耕社会中,尽管北方许多地方种植小麦,但由于技术落后,产量低,可不像如今今天食用。能顿顿吃上大白馒头,成了很多人的梦想。普通人家只有到了年底才能吃半个月左右。吃白面馍馍,走亲戚送“花馍”,既是享受一年劳动的最好收获,也是馈赠亲人的最佳年礼。于是,正月里,人们胳膊上挎着用竹子或芦苇编织的细篾红篮子,放进一定数量的馍馍,馍上覆着一块印花包袱,携家带口,互相走动“出门”,花花绿绿的新衣便把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路装扮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做花馍是一项费力费时的“工程”,春节前半个月左右就开始动手。在幼时的记忆中,哪家要做馍馍,邻里乡亲总聚在一起:小麦面粉加水后的揉、搓、团等“和面”重体力活由体力好的青壮年人承担,而擀、剪、切、扎、按、捏、卷等轻活由姑娘小媳妇们巧做,老人、小孩们加水添柴烧柴火。满屋子的欢声笑语营造出轻松的氛围,伴随着油香味、麦芽香味的花馒头一锅一锅出笼,一算子一算子掀起来,白花花的热气在冬日的寒峭中陡然腾起几米高,把眼睛都眯得睁不开。令人惊奇的是,平时村里邻间劳作,免不了产生各种小的矛盾、小的纠纷,它们却都在这腊月里的笑声中化散开,在这些小小的不断凝聚中暖柔融解。“远亲不如近邻”,一个小小的花馍馍制作工序,亦能把各家“簇合”在一起,你帮我,我帮你,流动着乡间了无痕迹的岁月时光。

除了走亲戚“出门”互赠外,在民间年俗文化中,花馍还用来祭神祭祖。儒家经典《礼记》指出,“古之君子,使必报之”,所载户、灶、中溜、门、行等五祀诸神,实际上乃围绕人们的生活生产而形成

「花馍」年俗的文化意蕴

■朱康有

成的泛神系统,祭拜之,以“报本返始”——报答天地的赐予、神灵的功德、祖先的积善,内含感恩之义,亦寄念护佑、期盼。巧手揉捏出来的花馍,有各式各样的形状。捏成布袋形状的花馍,置于盛放粮食的大圆旁,寓来年丰收之意;捏成鱼形的花馍,置于水瓮旁,盼年年有余。在娘娘庙供奉祭皮上点成石榴子的花馍,显然是希冀多子多福。正月十五,在花馍内加上油(俗称“灯盏馍”),揉捻棉芯点着,一夜不想,意指对来年前光明光明的期盼。可见,花馍馍在祭神祭祖中起到了一种沟通人与冥冥神明的作用。一跪一拜,一俯一合之间,整洁的是身心,表达的是崇高,年的“俗”味蒙上了神圣的意蕴。

走亲戚串门,一般篮子里放的是那种圆圆的“馄饨馍”。这“馄饨”二字,与“混沌”谐音,含浑全之意,有吉祥、喜庆、圆满、平安等寓意。礼尚往来,亲戚间走动,换的是馍馍,包含的是亲情的延续和不断认同。不过,你可不要小看这其中的门道,否则,会被旁人耻笑为不懂“礼”数。先送后送有讲究,送多少留多少也有说法。一般是外甥走姥姥家,闺女携婿走娘家,然后是去姑、姨、姐家。到长辈家,带12个馍馍,拿出8个留下4个(返回的篮子不能空);平辈之间走动,带12个馍馍,拿出6个留下6个。一来一往,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是“换馍”,它诠释的是尊敬长辈的孝道教化精神。

四十年来,在改革开放中,走亲戚的礼品更新换代很快。白面馍馍成了饭桌上随意取用的主食之一。先是点心和罐头取代了花馍,后来又是奶制品取代了点心、罐头。现在更是多样化了。这些演变无疑折射了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市场经济的繁荣。我想,这其中变的是“礼品”,不变的却是永远传承的年礼文化!

(作者系我市平陆籍人,在京工作多年。本文为其对幼时过年“出门”风俗的回忆)

2020年度全国楹联教育精英榜公布
运城两单位三人上榜

本报讯(记者 乔植)从市楹联学会获悉,中国楹联学会近日公布2020年度全国楹联教育精英榜,我市两单位三人上榜。

据了解,过去一年,全国楹联教育工作积极开拓、全面推进,取得了一系列新的成绩。经过推荐、评比等环节,中国楹联学会公布了2020年度全国楹联教育精英榜,旨在进一步推动全国联教工作深入发展。

该光荣榜设为“单位”和“个人”两大类,“单位”类评出了20家,

“个人”类评出了30个。我市上榜的两家单位分别是万荣县教科局、平陆县诗联学会;荣誉榜单的三人分别是:新绛县西街小学副校长吴海霞、垣曲县诗联学会副会长廉廷、天津市赵家庄初中校长李学俭。

近年来,市楹联学会围绕“服务政治、参与经济、荟萃精品、抓好普及”16字方针,联事(楹联事业)、联创(楹联创作)、联教(楹联教育)、联产(楹联产业)等工作迈上新台阶,特别是“楹联进校园”活动一直领跑全国。

刘宝玉作品: 牛年好运



秦新萍作品: 牛卧福地



防疫从我做起 (吕学峰作品)

新绛老年大学剪纸班
14名老人剪出“牛”剪纸

本报讯 看着一幅幅精巧的剪纸,仿佛触摸到时光的律动。新年伊始,新绛县老年大学剪纸班14名老人剪出一套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的“三牛”剪纸,赢得了众人称赞。

剪纸班共有14人,最大的学员吕学峰,年已九旬,最小的70多岁,其中还有两名自愿加入的新人。平时她们利用手中的剪刀,结合形势剪出了多样的剪纸。前几年,我国二十四节气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吕学峰十分兴奋和高兴,她把老年大学剪纸班的刘宝珍、刘宝玉等学员召集到一起说:“二十四节气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其绘画、诗词,我们见多了,剪纸很少见,我们何不发挥我们的一技之长,剪一套二十四节气剪纸。”就

这样,当时剪纸班六位老人根据二十四节气气候的不同特色、农事情况,反复考究,绘制图案,挥剪而成二十四节气剪纸。

今年适逢牛年,吕学峰又与剪纸班的14名老人刘宝珍、刘宝玉、宁海芳、杨双莲、秦新萍等在一起商量,以极大的热情剪出以牛为特征的剪纸,该剪纸作品以极富想象力的表现形式,表现了牛年更牛、牛气冲天的气魄,剪出了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的“三牛”精神。这套作品共40多幅,剪工精细,刻画细腻,她们的一招一式,把牛的习性刻画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三牛”剪纸作品问世后,人们对这件作品及其传递的丰富内涵报以满满的赞扬。

(柳文利)